

# 宜人性与抑郁的关系： 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与感知到竞争的调节作用

朱澄铨<sup>1,2</sup>, 苏芮莹<sup>3</sup>, 刘亚楠<sup>2\*</sup>

(1. 中山大学心理学系, 广州 510006; 2.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郑州 450001; 3. 南阳中心医院, 南阳 473005)

**摘要:** 宜人性与抑郁的关系尚未得出一致性结论。为了探索当前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对宜人性个体抑郁的影响, 研究采用宜人性量表、人际关系满意度量表、抑郁自评量表和感知到的竞争量表对 600 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 (1) 宜人性正向预测人际关系满意度和抑郁, 人际关系满意度负向预测抑郁, 人际关系满意度在宜人性和抑郁间起中介作用; (2) 感知到的竞争正向调节了宜人性与抑郁的关系, 高宜人性的个体在感知到高竞争时更容易抑郁; 感知到的竞争负向调节了宜人性与人际关系满意度的关系, 高宜人性的个体在感知到高竞争时人际关系满意度显著下降。结果揭示了激烈的竞争环境对宜人性个体心理健康的消极影响, 同时有利于深入理解人格特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

**关键词:** 宜人性; 抑郁; 感知到的竞争; 人际关系满意度

**中图分类号:** B8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3-5184(2025)01-0047-07

## 1 引言

人格是个体在思维、情感和行为方式上稳定的特征模式, 研究表明其对个体的心理及生理健康都有着深刻的影响(Steel et al., 2008)。宜人性作为大五人格维度之一反映的是个体对他人的友善程度, 高宜人性的个体往往谦逊、顺从、利他、信任, 具有很强的同理心(黄希庭, 2004)。先前研究发现较高的宜人性水平往往与个体积极的健康结果密切相关, 如更多的积极情绪、更高的主观幸福感、更低的心理障碍发生率、更低的死亡率等(Strickhouser et al., 2017)。然而, 宜人性与个体身心健康的关联尚存模糊之处。中国学者陈浩等人(2021)通过对美国国际区域水平的数据分析发现: 在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环境中, 较高的宜人性反而对个体的身心健康具有消极影响, 其将这种现象称为“宜人性之殇”。我国目前虽已通过“脱贫攻坚”等政策实现了对绝对贫困的消除, 但仍存在收入分配相对不平等的情况(杨肃昌, 杨移, 2022)。因此, 此研究意图在个体层面深入探索“宜人性之殇”现象。具体来说, 此研究探索了感知到的竞争对宜人性和抑郁关系的影响。

### 1.1 宜人性与抑郁

抑郁是一种常见的且具有弥散性的消极心境状

态, 其具体表现为个体情绪持续低落、对事物丧失兴趣、自我价值感水平较低以及精力不足等(Chaurasia et al., 2020)。有研究者指出抑郁已成为本世纪对个体身心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Holden, 2000)。我国研究者也发现近十年以来中国大学生的抑郁检出率较高, 且存在升高趋势(王蜜源等, 2020)。以往有关宜人性与抑郁的研究尚未得出一致性的结论。有研究发现宜人性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宜人性个体往往具有较好的人际关系, 而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在宜人性个体遇到负面生活事件时为其提供强大的社会支持, 帮助其选择合理的应对方式, 从而缓解负面生活事件的消极影响, 因此高宜人性的个体更不容易抑郁(连灵, 郭胜忠, 2017)。但也有研究指出, 由于高宜人性的个体同理心强, 比较敏感, 因此他们更容易对其他人以及环境中的负面情绪产生共情, 从而导致自身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并抑郁(Pearman et al., 2010)。

经过对文献的梳理, 有理由推测宜人性与抑郁的关系之所以会呈现出这种矛盾的状态, 是因为研究者在探究二者关系时未能充分考虑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人格特质通常与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共同对个体产生影响(迈尔斯, 2013)。具体地, 作为表达友善、他人取向和合作倾向的宜人性特质在群际和

\* 通信作者: 刘亚楠, E-mail: lynpsy@zzu.edu.cn。

谐的社会环境中有助于通过增强社会联系和增加积极情绪来提升个体的身心健康水平(陈浩等, 2021)。然而,当个体处于人际信任程度较低、竞争激烈的环境中时,宜人性所表达的谦虚、友善、利他等特质并不直接适用于人际竞争,个体的谦让和利他不仅得不到他人的正向反馈,而且还会带来个体利益的受损(Matz & Gladstone, 2020);在这种环境下宜人性不仅不能发挥自身的正向适应功能,甚至会带来个体的适应失调,进而对其身心健康造成损害(陈浩等, 2021)。因此,分析宜人性和抑郁的关系必须考虑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鉴于有研究者指出中国目前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收入不平等,群际、人际竞争激烈(黄宗智, 2021; 杨肃昌, 杨移, 2022)。因此研究认为宜人性可以正向预测抑郁(假设1)。

### 1.2 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人际关系满意度是个体根据自己选择的标准对其与他人心理关系进行的评价,这一评价反映了个体人际关系需要满足的水平(陈小华, 2007)。高宜人性个体往往信任、利他,在与他人合作时他们往往更注重集体的利益与关系的和谐,在适宜的环境中这些特征有利于其获得和保持较好的人际关系(Habashi et al., 2016)。

作为社会性生物,关系需要是人的基本心理需要之一,良好的人际关系将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显著地积极影响(吴才智等, 2018)。研究表明,个体的人际关系满意度越高,则其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而其人际关系的受损则会导致个体的焦虑、抑郁以及自伤等(黄垣成等, 2021)。因此,研究提出假设2:人际关系满意度在宜人性和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宜人性正向预测人际关系满意度,而人际关系满意度负向预测抑郁。

### 1.3 感知到竞争的调节作用

收入不平等作为一种宏观变量涉及多方面的因素,直接使用其可能导致难以准确识别环境中对个体身心健康影响的关键因素。研究意图在一个相对更加微观的层面上探索宜人性之殇现象,因此选取感知到的竞争作为指标。感知到的竞争表达了个体对竞争的本质认知和对竞争环境的感知,被认为能较好地反应竞争环境对个体的影响(Murayama & Elliot, 2012)。

陈浩等人(2021)发现宜人性和高竞争环境具有消极亲和性,在竞争激烈的区域宜人性显著负向的预测了人们的积极心理健康结果。虽然宜人性所

表现出的友善、合作、社会取向等特质是有益于个体的身心健康的,但是这些特质在高竞争环境中并不能发挥其积极作用,反而可能会因为适应失调给个体身心健康带来消极影响。宜人性个体为了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往往不愿表现出过强的进取心,而这在竞争背景下可能导致他们获得更低的薪水、更容易遭受经济困难,这将对个体的身心健康造成消极影响(Matz & Gladstone, 2020)。与此同时,宜人性个体具有较强的同理心和利他动机,他们往往特别注意自己的行为是否对他人造成了伤害并倾向于帮助他人,在竞争中个体可能更容易感知到他人的消极情绪并认为自己应该对他人的痛苦负责,这可能会提升个体焦虑与抑郁的风险(Tone & Tully, 2014)。因此,研究提出假设3:感知到的竞争调节了宜人性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当宜人性个体感知到较高等度的竞争时,宜人性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

此外,有研究者指出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个体会产生较强的人际不信任感以及对社会地位的焦虑,由此导致其会倾向于自我提升而非注重人际与集体和谐(Buttrick & Oishi, 2017)。在这样的环境中,高宜人性个体对于人际关系和他人利益的重视难以得到正向的反馈(Spurk & Abele, 2011)。因此,研究提出假设4:感知到的竞争调节了宜人性和人际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在宜人性个体感知到较高等度的竞争时,宜人性对人际关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

综上所述,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见图1)探索感知到的竞争对宜人性和抑郁关系的影响,并检验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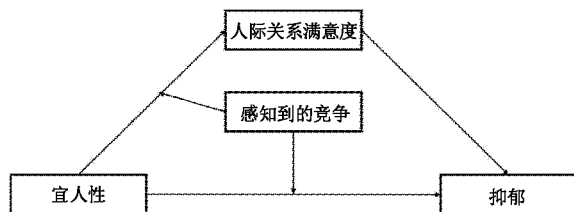


图1 假设模型图

## 2 方法

### 2.1 被试

研究使用随机抽样的方法,通过问卷星在线调查平台对河南省某两所高校共623名大学生进行了调查。问卷中以不规则间距设有3道判断被试是否认真作答的检测题项,以此作为判断问卷是否有效

的标准之一。删除无效问卷后共剩余有效问卷 600 份,有效率为 96.31%。其中男生 309 人,女生 291 人,平均年龄 21.75 岁,标准差 2.54。参考同类型研究者的做法,同时调查了参与者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拟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陈浩等,2021;Matz & Gladstone,2020)。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的测量采用了 Adler 等(2000)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阶梯的方法,给参与者呈现一个有 10 个等级的梯子,其中 10 级代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处在社会的最上层,1 级代表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处在社会的最下层,让参与者选择自己目前在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

2.2 调查工具

2.2.1 宜人性量表

使用王孟成等人(2011)编制的简版中国大五人格问卷中的宜人性分量表,量表共 8 个条目,例如:“我觉得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心怀善意的”、“当别人向我诉说不幸时,我常感到难过”。量表采用 7 点评分,分值越高表示个体的宜人性水平越高。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5。

2.2.2 人际关系满意度量表

使用陈小华等人(2007)修订的大学生人际关系满意度量表,量表包括交际屏障、互利支持、外向干练、相似相容、差异冲突和道德素质等 6 个维度共 36 个条目,具体条目例如:“我和他们能相互信任”、“我和他们沟通良好,有充分的交流”、“当我需要他们帮助时,他们常常借故走开”。该量表用于了解个体对人际关系满意的程度,量表采用 7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满意度越高。在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4。

2.2.3 感知到的竞争量表

使用 Murayama 和 Elliot(2012)编制的感知到的竞争量表测量个体感受到的竞争的激烈程度。采用回译法将其翻译为中文版。具体方法如下,由 2 名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及 2 名英语专业的研究生组成翻译小组,先由心理学研究生将英文项目翻译为中

文,再由英语专业的研究生将其回译为英文,能够被准确回译的项目被接受,不能准确回译的项目被重新翻译,直到能够被准确回译。翻译过程中由 1 名心理学教授基于专业性、通俗性、可理解性等指标对项目进行审核和修改,最终形成与原量表条目和计分方法相同的中文版量表。该量表包含 5 个条目,例如:“在我所在的城市中,人们似乎都在相互竞争”、“我正在与其他人竞争”、“人们似乎都觉得竞争是很重要的”等。量表采用 7 点计分,分数越高表示个体感知到的竞争程度越激烈。研究中该量表的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5。

2.2.4 抑郁量表

使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文版中的抑郁分量表(王征宇,1984),量表包括 13 个项目描述,如:“对事物不感兴趣”、“感到对前途没有希望”。量表设 5 个等级:“没有”、“很轻”、“中等”、“偏重”、“严重”,参与者被要求就最近一周内的实际感觉针对上述项目描述在量表上进行评价。量表分数越高代表参与者的抑郁水平越高。研究中,其克隆巴赫  $\alpha$  系数为 0.95。

2.3 统计方法

采用 SPSS 24.0 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使用 Hayes(2013)开发的 Process(3.3)宏程序进行中介及调节效应的检验。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根据周浩和龙立荣(2004)的建议,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对共同方法偏差进行估计。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量为 35.73%,小于 40%的临界标准,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描述性统计

如表 1 所示,宜人性与人际关系满意度显著正相关、与抑郁显著负相关,感知到的竞争与人际关系满意度显著负相关、与抑郁显著正相关,人际关系满意度与抑郁显著负相关。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矩阵

	<i>M</i> ± <i>SD</i>	1	2	3	4
1. 宜人性	4.47 ± 1.34	1			
2. 感知到的竞争	5.11 ± 1.73	0.03	1		
3. 人际关系满意度	3.68 ± 1.04	0.47***	-0.57***	1	
4. 抑郁	3.27 ± 1.34	-0.16***	0.72***	-0.77***	1

注: *N* = 600, \*\*\* *p* < 0.001,下同。

### 3.3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

在进行进一步检验前,每个预测变量的得分均被进行了标准化处理,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 $<2.38$ )和容忍度(均 $>0.55$ )均符合标准,表明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此外,参考同类型研究的做法(陈浩等,2021;Matz & Gladstone,2020),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居住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等变量被纳入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

根据 Hayes(2013)的推荐,采用 PROCESS 宏程序中的 Model 8 (Bootstrap = 5000) 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如图 2 所示,当因变量为人际关系满意度时,宜人性与感知到的竞争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人际关系满意度( $\beta = -0.22, P < 0.001$ );当因变量为抑郁时,宜人性与感知到的竞争的交互项显著正向预测抑郁( $\beta = 0.08, P < 0.001$ )。进一步的,根据温忠麟和叶宝娟(2014)的建议,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判断可以通过检验调节项不同取值情况下( $\pm 1SD$ )中介效应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来进行,如差异显著,则说明有调节的中介成立。结果显示,在感知到的竞争程度高时( $+1SD$ ),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显著(95% BootCI:  $[-0.51, -0.35]$ );在感知到的竞争程度低时( $-1SD$ ),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显著(95% BootCI:  $[-0.21, -0.11]$ );调节变量高水平下( $+1SD$ )的中介效应和调节变量低水平下( $-1SD$ )的中介效应差异显著(95% BootCI:  $[0.20, 0.34]$ )。综上,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显著。

为了进一步明确感知到的竞争在模型中的调节作用,取其 $\pm 1SD$ 的值绘制交互效应图。如图 3 所示,当个体感知到的竞争较弱时,宜人性显著正向预测人际关系满意度,个体的宜人性水平越高,其人际关系满意度越高;而当个体感知到的竞争较强时,高、低宜人性个体的人际关系满意度水平都较低,且宜人性对人际关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下降。如图 4 所示,当个体感知到的竞争程度较低时,高宜人性个体和低宜人性个体的抑郁水平都较低,而当个体感知到的竞争程度较为激烈时,高、低宜人性个体的抑郁水平都较高,且个体的宜人性水平越高,其抑郁的水平也越高,宜人性对抑郁预测作用增强。

## 4 讨论

### 4.1 宜人性与抑郁的关系

研究发现宜人性可以正向预测抑郁,此结果与研究假设及先前部分研究结果一致。高宜人性的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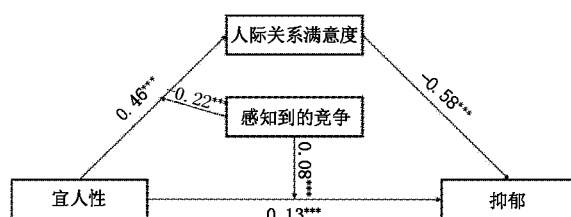


图 2 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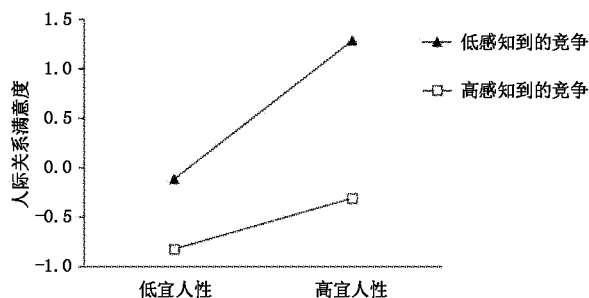


图 3 感知到的竞争对宜人性与人际关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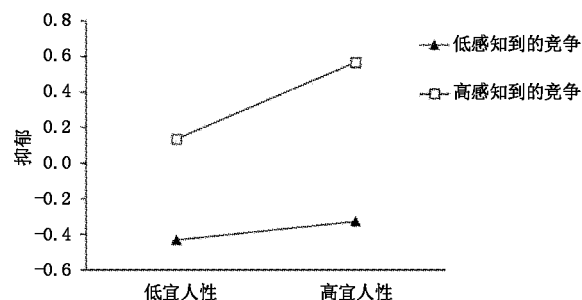


图 4 感知到的竞争对宜人性与抑郁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体更容易抑郁是因为他们的同理心过强,较为敏感,容易对他人或环境中消极情绪起反应所导致(Pearman et al., 2010)。Tone 和 Tully(2014)指出,尽管高同理心或共情能力被普遍认为是一种积极的品质,与个体的积极健康结果及道德成就正相关,但是在其水平过高的时候也会给个体带来健康风险,如焦虑和抑郁。具体来说,过高的同理心或共情能力可以通过人际导向的个人痛苦和内疚两条路径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前者是个体对于他人负面情绪的一种不适应的情感反应(如过于悲伤、恐惧等),这种情感反应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且往往伴随着生理上的过度紧张与行为退缩,因此会导致消极的心理健康结果(Tone & Tully, 2014; Zahn - Waxler et al., 2012);而内疚通常由过高的利他主义动机所驱动,在这种过度的利他动机中个体往往不合理的认为帮助他人减轻痛苦应是自己的责任,自己应对他人的痛苦负责,这也对个体的心理健康具有消极影响(Zahn - Waxler et al., 2012)。

## 4.2 人际关系满意度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人际关系满意度部分中介了宜人性和抑郁的关系,验证了研究假设2。宜人性个体在本质上是善良、友好、利他的,这些亲社会特性有助于个体与他人建立积极的联系,获得较高的人际关系满意度;良好的人际关系是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保护因素,当个体人际关系满意度较高时,他们就更不容易焦虑、抑郁,因此人际关系满意度可以中介宜人性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具体来看中介路径,首先,中介路径前半段宜人性正向预测人际关系满意度。高宜人性个体往往具有信任、利他、同情等特点,这些特点有助于其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黄希庭,2004)。高宜人性个体在与他人相处时往往特别注意体会他人的想法和行为,注重维护整体关系的利益,这使得高宜人性在人际交往中拥有较高水平的人际吸引力,有助于他们建立丰富的人际关系(Habashi et al., 2016);此外,有研究表明宜人性是影响人际信任的根源特质之一,良好的人际信任对人际关系质量有着积极的影响(Rotenberg et al., 2005)。因此,宜人性可以正向预测人际关系满意度。其次,中介路径后半段人际关系满意度负向预测抑郁。良好的人际关系不仅是个体主观幸福感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对个体的生命意义也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吴才智等,2018)。人际关系的受损则会导致一系列的消极心理健康结果,例如焦虑、抑郁以及自伤等(黄垣成等,2021)。因此人际关系满意度负向预测抑郁。

## 4.3 感知到竞争的调节作用

### 4.3.1 感知到竞争对宜人性和抑郁之间关系的调节

研究发现在感知到竞争水平高时,宜人性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会增强,验证了假设3。这可能是由于三方面的原因引起的。首先,宜人性的个体不适应于竞争环境,在竞争时其容易因为自身特质的原因遭遇困境。在处理可能的冲突时宜人性和回避、迁就、合作等风格正相关,和竞争风格负相关(Tehrani & Yamini, 2020)。高宜人性个体为了维护和谐的人际关系,往往不愿去表现出强的进取心和竞争意愿(Spurk & Abele, 2011),而在刻板印象的“热情-能力”两维度模型中,这样的个体往往容易被知觉为低能力的,因此他们更可能得到较低的薪水进而容易陷入到经济困难中,而经济困难会进一步地对个体的身心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Matze &

Gladstone, 2020)。其次,竞争可能会损害宜人性个体的真实性。真实性指的是个体外部行为与内在价值观、欲望、兴趣、特质相一致,是个体知觉到真实自我并且践行(Wood et al., 2008)。研究表明真实性能够为个体带来幸福与意义,而不真实则会导致焦虑、抑郁等(Chew & Ang, 2021)。宜人性个体的本质是信任、谦让、利他、友好的,让其参与到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去与他人去竞争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其自身的本质特点,由此可能导致其体验到不真实感进而影响到心理健康。最后,在高竞争环境下社会负面情绪上升,宜人性个体更易因为其高同理心的特质产生人际痛苦和内疚,这二者也会对其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导致抑郁等负面心理健康结果(陈浩等, 2021; Tone & Tully, 2014)。

### 4.3.2 感知到竞争对宜人性和人际关系满意度之间关系的调节

研究发现在感知到竞争水平高时,宜人性对人际关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会减小,验证了研究假设4。这可能是由于以下原因引起的。高宜人性的个体通常信任、利他,格外重视和他人维持积极的人际关系,但是激烈的竞争环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人际信任感下降,社会地位焦虑上升,人际关系紧张(Buttrick & Oishi, 2017),这将损害宜人性个体的人际关系满意度。而个体人际关系的受损将直接为其带来抑郁风险(黄垣成等, 2021)。此外,在竞争环境下很难有完美的双赢的局面的达成,当其中的某一方受到伤害时,高同理心所带来的人际关系导向的痛苦与内疚可能也会导致高宜人性个体人际关系满意度下降(Tone & Tully, 2014)。

## 4.4 研究不足与展望

研究的主要局限包括以下几点。首先,研究的主要参与者为大学生,这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能直接推广到其他群体中去。不同群体面对的竞争情况和需要承担的后果是不同的,这可能导致不同的消极心理健康结果。未来可通过对多样化样本的调查来探索此问题。其次,研究只选取了心理健康指标,睡眠质量下降、饮食失调以及其他生理指标应在未来研究中被纳入以进一步地揭示竞争性环境的消极影响。此外,研究初步地证实了竞争环境对于宜人性与抑郁关系的可能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先前有我国研究者发现在控制大五人格其他人格维度后,宜人性无法对个体幸福感指标进行预测(张兴贵, 郑雪, 2005)。因此,未来在对宜人性与个体心理健

康的关系进行探究时,应在明确了环境因素的影响后,进一步地考虑其他人格因素的可能影响。

中国在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形成了以性本善为主的文化心理基础,尊重他人、利他友好的思想刻在每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性和国民性(李抗,2020)。宜人性作为一种真诚、友好、利他的人格特质,与我国性本善的文化基础十分契合。文化—个体一致性理论认为,当个体具备在其所处文化中更受重视的特质时,会体验到更高水平的幸福感(Diener,2012),然而此次研究中却发现,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高宜人性的个体似乎过的并不幸福,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观与微观环境、文化与现实环境之间的差异对个体心理健康的不同影响。我国文化重视善良、宣扬善良,如何让善良的宜人性个体发挥出本来该具有的幸福优势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此外,此次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感知到的竞争的消极影响。激烈的“内卷化”是当前社会所面临的一个重要现实问题,已有研究发现其会对就业、经济等现实问题产生消极影响(黄宗智,2021),此次研究结果进一步地指出其同时还会深刻的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如何避免内卷,避免内卷给个体带来的多层面的消极影响是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们所需要共同关注的。

## 5 结论

(1)人际关系满意度部分中介了宜人性和抑郁之间的关系,宜人性水平越高,人际关系满意度越高,抑郁水平越低。

(2)感知到的竞争调节了宜人性和人际关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感知到的竞争水平升高,宜人性对人际关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作用减弱。

(3)感知到的竞争调节了宜人性和抑郁之间的关系。感知到的竞争水平升高,宜人性对抑郁的正向预测作用增强。

## 参考文献

- 陈浩,洪斌,赖凯声.(2021).宜人性之殇:收入不平等对国家宜人性人格与国民健康指标间关系的系列负性调节效应.《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192-221.
- 陈小华.(2007).大学生人际关系满意感与自尊、心理控制源的相关研究(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福建.
- 戴维·迈尔斯.(2013).社会心理学(第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
- 黄垣成,赵清玲,李彩娜.(2021).青少年早期抑郁和自伤的联合发展轨迹:人际因素的作用.《心理学报》,53(5),515-

526.

- 黄希庭.(2004).人格心理学.浙江教育出版社.
- 黄宗智.(2021).再论内卷化,兼论去内卷化.《开放时代》,(1),157-168.
- 连灵,郭胜忠.(2017).大学生宜人性和心理幸福感的关系:领悟社会支持和感恩的链式中介作用.《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5(1),163-166.
- 李抗.(2020).中国人的文化会聚性自我构念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南京师范大学,南京.
- 王孟成,戴晓阳,姚树桥.(2011).中国大五人格问卷的初步编制Ⅲ:简式版的制定及信效度检验.《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4),454-457.
- 王蜜源,韩芳芳,刘佳,黄凯琳,彭红叶,黄敏婷,赵振海.(2020).大学生抑郁症状检出率及相关因素的meta分析.《中国心理卫生杂志》,34(12),1041-1047.
- 王征宇.(1984).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上海精神医学》,(2),68-70.
- 温忠麟,叶宝娟.(2014).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检验方法:竞争还是替补?《心理学报》,(5),714-726.
- 吴才智,荣硕,朱芳婷,湛燕,郭永玉.(2018).基本心理需要及其满足.《心理科学进展》,(6),1063-1073.
- 杨肃昌,杨移.(2022).新时代相对贫困与资源分配不平等相关性研究.《上海经济研究》,(3),31-47.
- 周浩,龙立荣.(2004).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心理科学进展》,12(6),942-950.
- 张兴贵,郑雪.(2005).青少年学生大五人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心理发展与教育》,21(2),98-103.
- Adler, N. E., Epel, E. S., Castellazzo, G., & Ickovics, J. R. (2000). Relationship of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social status with psychological and physiological functioning: Preliminary data in healthy, White women. *Health Psychology*, 19(6), 586-592.
- Buttrick, N. R., & Oishi, S. (2017). The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of income inequality.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11(3), e12304.
- Chaurasia, N., Singh, I. L., Singh, T., Tiwari, T., & Singh, A. (2020). Effect of depression on attentional network system among rheumatoid arthritis patients—A cross-sectional study. *Journal of Family Medicine and Primary Care*, 9(4), 1974-1980.
- Chew, L. C., & Ang, C. S. (2021). The relationship among quiet ego, authenticity, self-compassion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adults. *Current Psychology*, 42(7), 5254-5264.
- Diener, E. (2012). New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 for subjective well-being research. *American psychologist*, 67(8), 590-597.
- Habashi, M. M., Graziano, W. G., & Hoover, A. E. (2016). Searching for the prosocial personality: A Big Five approach to

- linking personal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42(9), 1177 – 1192.
- Hayes, A. F. (2013). *Introduction to mediation, moderation, and conditional process analysis: A regression – based approach*. NY: The Guilford Press.
- Holden, C. (2000). Global survey examines impact of depression. *Science*, 288(5463), 39 – 40.
- Matz, S. C. , & Gladstone, J. J. (2020). Nice guys finish last: When and why agreeableness is associated with economic hard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18(3), 545 – 561.
- Murayama, K. , & Elliot, A. J. (2012). The competition – performance relation: A meta – analytic review and test of the opposing processes model of competition and performa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8(6), 1035 – 1070.
- Pearman, A. , Andreoletti, C. , & Isaacowitz, D. M. (2010). Sadness prediction and response: Effects of age and agreeableness. *Aging & Mental Health*, 14(3), 355 – 363.
- Rotenberg, K. J. , Fox, C. , Green, S. , Ruderman, L. , Slater, K. , Stevens, K. , & Carlo, G. (2005). Construction and validation of a children's interpersonal trust belief scale. *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3(2), 271 – 293.
- Steel, P. , Schmidt, J. , & Shultz, J. (2008). Refi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subjective well – 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34(1), 138 – 161.
- Strickhouser, J. E. , Zell, E. , & Krizan, Z. (2017). Does personality predict health and well – being? A metasynthesis. *Health Psychology*, 36(8), 797 – 810.
- Spurk, D. , & Abele, A. E. (2011). Who earns more and why? A multiple mediation model from personality to salary.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 26(1), 87 – 103.
- Tehrani, H. D. , & Yamini, S. (2020).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styles: A meta – analysi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57, 109794.
- Tone, E. B. , & Tully, E. C. (2014). Empathy as a “risky strength”: A multilevel examination of empathy and risk for internalizing disorders. *Development and Psychopathology*, 26(42), 1547 – 1565.
- Wood, A. M. , Linley, P. A. , Maltby, J. , Baliousis, M. , & Joseph, S. (2008). The authentic personality: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conceptual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uthenticity Scale. *Journal of Counseling Psychology*, 55(3), 385 – 399.
- Zahn – Waxler, C. , Cole, P. M. , & Barrett, K. C. (1991). Guilt and empathy: Sex difference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on. In J. Garber & K. A. Dodge (Eds.),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gulation and dysregulation* (pp. 243 – 272).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Agreeableness and Depressi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mpetitiveness

Zhu Chengquan<sup>1,2</sup>, Su Ruiying<sup>3</sup>, Liu Yanan<sup>2</sup>

(1.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Sun Yat – 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3. Nanyang Central Hospital, Nanyang 473005)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relationship and mechanism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depression in a high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this study was conducted on 600 college students using the Agreeableness Scale, the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 Scale, the Depression Scale, and the Perceived Competitiveness Scal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Agreeableness positively predicted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 and depression; and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 negatively predicted depression. The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 plays a mediating rol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depression; (2) Perceived competitiveness posi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depression, and individuals with high agreeableness were more likely to be depressed when they perceived high competitiveness; Perceived competitiveness negatively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eeableness and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 and individuals with high likability experienced a significant decrease in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 when they perceived high competitiveness. This study sheds light on the adverse impact of the current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n individuals' mental health, contributing to a more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play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environment.

**Key words:** agreeableness; depression; perceived competitiveness; interpersonal satisfaction